

宏观视野下明清时期苏州丝绸的国际辐射圈

敬森春

(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江苏苏州 215123)

摘 要:在当前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宏观背景下,关于明清时期苏州丝绸史的研究具有重大的现实与历史意义。文章通过文献分析法与数据整合,以明清时期苏州丝绸的发展为视角,揭示苏州丝绸的发展与对外贸易的盛况。研究表明,明清时期苏州丝绸已经在国际市场上占据重要的地位,并在全球市场上衍生出一个商贸兼具文化的辐射圈。

关键词:明清时期;苏州丝绸;海外贸易;国际市场;辐射圈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3851(2017)03-0216-07

关于明清时期苏州丝绸外贸问题的研究,不仅是认识明清时期苏州丝绸业发展的重要一环,也是认识中国对外贸易史的重要一环,更是认识历史时期“海上丝绸之路”与当前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二者关系的重要一环,也有助于了解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所传承的“多元共融”的文化内核精神。

苏州之地,“名标十望,地号六雄”,《隋书·地理志》称其曰:“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1]明清以来更是凭借其“苏”字牌的传统工艺引领天下潮流^[2]，“苏”牌工艺在北上进宫引领宫廷时尚的同时^[3]，也因漂洋过海发展对外贸易享誉域外诸国。在苏州传统工艺品中，吴地丝绸自古以来名扬海外，至明清之时，更是发展鼎盛，以丝绸为主要媒介进行的海外贸易，更是在全球范围内衍生出一个以苏州产品为核心的辐射圈。本文所讨论之苏州丝绸，不限于如今苏州行政区划内出产之丝绸，乃是基于从大范围的吴文化视野，立足于李伯重先生所定义的江南“八府一州”^①区域所作之考量。

一、明清苏州丝绸业发展的区位优势

明清之时，苏、杭、宁并列为我国丝绸三大出产中心，苏州号称一日可出万锻绸，衣被天下，遍地皆

是蚕桑，满目布满锦绣，以至有“绣市”之称，明人张翰在其《松窗梦语》中记载道：“余尝总览市利，大都东南之利，莫大于罗绮绢绌，而三吴为最。”^{[4]76}据记载，嘉靖年间，“绫锦纴丝，纱罗，绢，皆出郡城机房，产兼两邑，而东城为盛，比屋皆工织作，转贸四方，吴之大资也”。^[5]

苏州丝绸享誉海内外，欲知明清时期苏州丝绸业之发达，须深刻理解苏州产业基础之优势，如此方知苏州丝绸之盛并非一枝独秀，实乃经济文化等多元一体发展之结果。

(一)苏州丝绸业发展的产业区位

“苏”牌产品众多乃是苏州产业发展优势的表现。苏州传统工艺以其独特之风格，可以冠之以“苏”牌产品之名，“苏”牌之工艺以其种类之繁多、独特之风格、精美之样式、鬼斧神工之技艺扬名天下，在明代之时更是以吴中绝技蜚声全国，常常引领天下之潮流，明人在札记中记道：“自昔吴俗习奢华，乐奇异，吴制器而美，以为非是弗珍也，四方重吴服，而吴益工于服，四方贵吴器，而吴益工于器。”^{[4]70}当下，“苏”字打头的苏州工艺品牌，几近都是在明代形成的^[6]。明清时期，苏州传统工艺发展之盛，明末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记载：“良玉虽集京师，工巧则

收稿日期:2016-11-03 网络出版日期:2017-03-28

作者简介:敬森春(1992-),男,四川广元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明清史方面的研究。

① 八府一州:苏州府、松州府、常州府、杭州府、嘉州府、湖州府、江宁府、镇江府、太仓州。

推苏郡。”^[7]虽是人文荟萃之京师亦不可及,其传统工艺颇得时人关注,对于苏州传统工艺之概述,方知苏州产业之优势。

在传统中国社会,农业、手工业、商业等难说分离,不同的产业领域之间的联系可谓千丝万缕,苏州传统工艺产业的发达,可以说明苏州地区已经具备、拥有支撑产业发展的经济基础和产业工人,向更加广阔地方面探讨,可以说苏州地区已经具备了一定的产业市场,在产业大发展的这样一个环境中,不同的产业领域齐头并进,竞相发展。产业的发展是一个联动的发展,是一个彼此影响的发展,在具备从事产业人员、拥有娴熟产业技术、产业市场广阔的这样一个良性发展的环境中,苏州丝绸业的发展可谓具备了相当大的产业基础优势。

(二) 苏州丝绸业发展的地缘区位

1. 经济发达是基础

姑苏乃东南财富之地,江左人文之乡,可谓红尘中一二等富贵之地,左思的《吴都赋》形容为“富中之叱,货殖之选,乘时射利,货车巨万”^[8]。自古以来苏州即是鱼米之乡,刘宋之时苏州“一郡之丰,可供数郡之用”^[9],隋唐之时,不仅供应京师关中,还可转运东都洛阳。宋代之时,更有谚语“苏湖熟,天下足”之称,明代之时,《明史》有云:“苏、松、常、镇、杭、嘉、湖七府,供输甲天下。”^[10]一直到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苏松常镇杭嘉湖七府的额征田赋,计地丁银 3115477.82 两,占全国地丁银 30228896 两的 10.31%,米麦计 3002581.49 石,占全国米麦 8821182.81 石的 34.04%。^[11]经济之繁华使已成为中国丝绸业之都和最重要的金融中心之一的苏州,在 16 世纪后期人口增长迅速,总数超过了 50 万,使它成为世界最大、最富裕的城市之一。^{[12]388}

2. 交通优势是保障

《史记·河渠书》载:“于吴,则通渠三江五湖。”^[13]到了明代苏州已经依靠其便利的交通发展成为一个商贸型大都市,对此,有诗云:“已出天地外,狂澜尚尔高,蛮商识吴路,岁入几千艘。”到清初时,苏州的地位则日益提升,时人以苏州为天下四聚之一,称天下有四聚,“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立的《陕西会馆碑记》评价苏州优越的交通位置道:“苏州为东南一大都会,商贾辐辏,百货骈阗,上自帝京,连交广以及海外诸洋,梯航毕至,山海所产之珍奇,外国所用之货贝,四方往来千里之商贾,骈肩辐辏。”^[14]

二、苏州丝绸国际市场的形成与对外贸易

(一) 苏州丝绸国际化市场的形成

1. 东亚市场圈

明代时期东亚市场圈的形成与白银流通密切相关。据记载:“从中国运出的主要是生丝和丝绸,当时在澳门每担生丝售价约 80 两白银,运至果阿则可售至 200 两,利润在一倍以上,万历八年至十八年,葡商每年从中国运出生丝约 3000 担,获利约 36 万两白银。”巨大的外贸利润必定推动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反过来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必然产生对以白银为货币的极大需求,自新航路开辟之后,大量白银流入中国。表 1 为明朝末期白银流入中国的统计情况。

表 1 明末流入中国白银统计 万两

年份	日本	马尼拉 (西班牙)	荷属东 印度	合计
1636	252	200	38	490
1637	338	362	19	719
1638	332	159	46	537
1639	354	243	53	650
1640	341	106	70	517
1641	320	285	52	657
1642	120	266	51	437
1643	113	143	34	290
1644	184	38	21	243

注:本表来源于文献:李隆生,明后期海外贸易的探讨[D].上海:复旦大学,2004:116-117.

其中,日本作为东亚地区的主要产银国,在此背景下,两国的贸易变得很兴盛,中国主要输出生丝和丝制品,日本输出白银,与日之间频繁的贸易往来,刺激了江南地区丝绸业的发展。“明清时期出口的中国丝绸和丝织品,可以视为基本上就是江南所产,至少在清中期以前,中国的丝绸出口实际上就是江南的丝绸出口。”^{[15]318}“江南市场与国际市场联系因此空前加强,形成了以江南为中心的东亚市场圈。”^[16]在东亚市场圈中,苏州地区作为江南的核心地位是不言而喻的,可以说苏州丝绸是江南丝绸这一品牌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东亚市场圈是苏州丝绸全球市场的奠基板块与重要组成部分,苏州丝绸通过在东亚海域的贸易往来逐步跨出近海走向大洋。

2. 丝绸国际市场

东亚市场圈的形成成为丝绸国际市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随着新航路的开辟和贸易格局的变化,苏州丝绸国际化市场随着对外贸易的开展已经渐渐成

型。“而且在1514年至1662年间,中国的人民政府都卷入了‘现代世界体系’发展的第一阶段之中,并受其影响,这种卷入是通过将除了南极洲、澳洲之外的所有大陆连接起来进行商品、谷类植物、疾病、人员和思想交流的海上道路来实现的。”^{[12]307} 国际市场形成后,“单是明后期进出口贸易的总额平均每年高达1647万两白银左右,每年的贸易赢利达942两左右”^[17]。可见国际化市场的形成对于出口贸易的推动是巨大的。

(二)明清苏州丝绸外贸发展

16世纪末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称赞苏州的外贸盛况曰:“它是这个地区的最重要的城市之一,以它的繁华富饶,以它的人口众多和以使一个城市变得壮丽所需的一切事物而闻名,经由澳门的大量葡萄牙商品以及其他国家的商品都经过这个河港,商人一年到头和国内其他贸易中心在这里进行大量的贸易,结果是在这个市场上样样东西都能买到。”^[18]

1. 明清时期的对外贸易

明代郑和下西洋,外国贡使更是络绎而来,海外诸商贾仰慕苏州产品,一时之间苏州“帆摘林立,九夷百番,进贡方物,道途相属,方舟大船,次第来舶”。表2为1611—1637年中国船只赴日贸易统计表。

表2 1611—1637年中国船只赴日贸易统计

年	船只数/艘	年	船只数/艘
1611	70	1625	60
1612	30	1631	60
1613	20	1632	4
1614	60~70	1634	36
1623	36	1635	40
1624	38	1637	64

注:本表来源于文献:刘序枫. 明末清初的中日贸易与日本华侨社会[J]. 人文及社会科学集刊, 2000, 11(3).

崇祯十七年(1644年),据载一民间商船载员二百十二人,自苏州启航去日本经商,带去“纺丝、绫丝、细丝等价值万余两”的贸易品,苏州商人在日本从事贸易活动长达八年之久。明朝中后期,中国的丝绸产品通过闻名世界的菲律宾马尼拉大帆船中转输往拉美各地,“1601年,在海上失事的商船圣托马斯号,所载丝货价值竟超过法定限额200万比索”^{[19]67}。在马尼拉贸易繁盛时期,每年开往菲律宾的中国商船常在二十到六十艘之间。^{[19]64} 表3为墨西哥抵达中国或菲律宾商船数。

表3 墨西哥抵达中国或菲律宾商船数 艘

年代	抵达中国	抵达菲律宾	年代	抵达中国	抵达菲律宾
1572	33	5	1574	—	6
1575	—	12~15	1576	—	趋于稳定
1580	—	40~50	1587	—	30

注:本表来源于文献:范金民. 衣被天下:明清江南丝绸史研究[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6: 343.

2. 苏州丝绸的转运外贸

由于明清时期中国的丝绸生产以江南为最,江南绸缎誉满海内外,江南本地出口的绸缎系当地所产自不待言,即使福建、广东等出口的丝绸也大多由江南转运而至。^{[15]318}

乾隆年间,闽粤两省商人为了牟取转运出口的巨额利润,每年都要来江南一带收购丝绸,而“苏杭二处走广商人贩入广省,尚不知凡几”,“外洋各国夷船到粤,贩运出口货物,均以丝货为重,每年贩卖湖丝并绸缎等货自二十万斤至三十二三万斤不等,其货均系江浙等省商民贩运来粤,转售外夷,载运回国”。^[20]

表4为明朝中后期葡萄牙商人转运中国丝绸赴日贸易表,表中所列数据可知澳门在中日丝绸贸易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澳门不仅成为葡萄牙和中国之间的贸易转运港口,但也是商业和葡萄牙、日本、东南亚和印度之间的贸易枢纽”^{[21]237},“它深刻改变了中国整个对外贸易的格局,在此后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澳门成为了东西方贸易的商业中心”^{[21]237}。1590年至1610年期间,澳门成为联系日益发展的国际海上丝绸之路与明代后期中国过热的社会经济的枢纽。^[22]

表4 明朝中后期葡萄牙商人转运中国丝绸赴日贸易表

丝制品	数量/担	销售收入/两
白色生丝	400~500	86250
特级生丝	500~600	79750
普通生丝	400~500	86250
丝织品	1700~2000	5088

注:本表来源于文献:李隆生. 明后期海外贸易的探讨[D]. 上海:复旦大学, 2004: 67.

三、苏州丝绸产品的国际辐射圈

苏州丝绸产品在国际上主要销往东亚、南洋、欧美三个地区,根据苏州丝绸在国际市场上的销售地区,可以将国际辐射圈分为东亚辐射圈、南洋辐射圈、欧美辐射圈。

(一) 东亚辐射圈

1. 苏州丝绸在日本

(1) 商贸上,明清之时,日本对于中国之产品的依赖程度甚高,“大抵日本所需皆产自中国,他如饶

之瓷器,湖之丝绵,漳之纱绢,松之棉布,尤为彼国所重”。故时人有言曰:“贩日之利,倍于吕宋”^[23],巨额利润的驱使更是使得许多商人甘愿与之贸易,以至于有“先朝禁通日本,然懂之利倍徙于西,海舶出海时,先向西洋行,行既远,乃复折而入东海,嗜利走死,习以为常,以是富甲天下”。

葡萄牙耶稣会会员罗德里格斯曾在日本传教,在他的日记里描绘了苏州丝绸在日本市场的受欢迎情况:“在古代,甚至直到我们来到日本的时期,丝绸的使用是罕见的,而且由于丝绸的匮乏,普遍人不使用它,士绅也不穿,领主即使穿也不是经常的……但是自从丰臣秀吉时代以来,整个王国实现了全面的和平,贸易得到如此的增长,以至于全国都穿上了丝袍,甚至农民和他们的妻子都有丝肩带,他们中境况较好者甚至有丝袍。”^{[12]381}

(2)文化上,苏州丝绸对日本的“衣”产生的影响可以说延续至今,日本、朝鲜之衣物服饰制度皆取自中华,日本学者在《纺织技术之历史》一书中说道:秦时吴地有人东渡日本传授蚕织和服饰技术。苏州地区所刺绣之服装更是为日本人所喜爱,尤其是中国谓人之“和服”,日本人称之为“吴服”,实乃“和服”即“吴服”的谐音,吴服者,吴地之服,东汉之末时传入日本,日本人称这绢布为“吴机织”,到了隋唐,大量的日本留学生以“遣隋使”、“遣唐使”的名义来长安,将隋唐的正式官服移植回了日本,但江南吴地的服装继续在日本民间发展成为其民族服装——“和服”,日本江户时代的《装束要领抄》认为:“和服沿唐衣服而其制大同小异益,本邦通中华也始于汉,盛于唐世时,朝廷命贤臣因循于往古之衣冠而折衷于汉唐之制,其好者沿焉不好者草焉而为,本邦之文物千岁不易之定式也”,直至明代日本人仍以中华服饰制度为标准进行服饰改革,这一切都是自丝绸贸易而带来的。

同属东亚的日本是中国生丝和丝织品的主要海外市场,明人徐光启曾经说道:“彼中百货,取资于我,最多者无若丝。”^{[24]91}“从16世纪后期到1630年代早期,日本人每年进口的生丝,其中大部分来自中国,估计从6万公斤增至28万公斤。”^{[12]380-381}“每百斤值银五六百两,取去者其价十倍。”^{[24]91}苏州民间商贩经常不顾政府禁令,载纺丝、绫丝、绉丝等货物前往日本与之贸易。日本人松浦章《中国商船的航海日志》一书载:“日本嘉永五年正月初六,清咸丰二年一月二十六日,由苏州起航的丰利号商船抵达日本长崎港口,丰利号商船从苏州带去的主要货物有大呢、羽毛、绸、绉、京布以及中药材。”^[25]发展到后

来,市场不断扩大,苏州商人则开展获利更为丰厚的“资本输出”,例如清代咸丰年间,经营纱缎的苏州商人,还到日本、朝鲜“自行设庄营业”,仅在日本每年销售纱缎“有二万匹之多”,至清朝末年,因时局所迫,难受日本加征关税之盘剥,设在日本的苏州商号才不得不倒闭歇业回国。

2. 苏州丝绸在朝鲜

(1)商贸上,从明清之际,苏州商人对外贸易的市场主要是日本、朝鲜,而销售的产品也当以丝绸为主,有记载道称朝鲜“对中国丝织品素表欢迎,其输入品从前为苏州之官纱、官纱、亮纱、纺绸、素罗、板绫、库缎等,每年约需数万匹。”每年销往朝鲜的苏州丝绸达万匹,可知苏州丝绸在朝鲜市场之广阔,“向为中国大宗贸易,每岁产额几千万元,工商之赖以生活者几千万人,其对外贸易较大者向有二种,一销高丽、安东等处者,名高丽纱缎,一销南洋群岛各处者,各曰阔货”^[26]。对于结婚成家这种大事,更是要使用中国之物方显隆重“至于婚可,非异土之物拟不成礼”^{[27]120}。

(2)文化上,明清两代,朝鲜作为中国的藩属国,与中国之贸易可谓十分密切。朝鲜贫瘠,与之相比,中国则是物产丰富,对此,朝鲜使臣在《燕行录》中感慨道:“邹平县虽是山东最为残破的一个县,而物品之丰盛远盛于朝鲜王京。”^{[27]120}朝鲜人对中国物品之喜爱更是无以复加:“服饰竞用唐物,上下无别。”^{[27]120}

(二) 南洋辐射圈

南洋之名,乃是明清时期中国对东南亚一带称呼,本就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一个概念,而这个中心则是通过商贸往来形成的。“凡南北舟车,外洋商贩,莫不毕集于此,南洋各国,皆好中国绫罗杂缯,服之以为华好。”^[28]中国台湾学者全汉升认为明代中国与菲律宾之间的贸易产品,以粮食、军需品和丝绸产品三类为主。苏州丝绸在南洋地区的辐射影响体现在苏州丝绸的出口量上,虽然对于苏州丝绸具体的出口额我们难以得知,但可以根据中菲贸易中的船只往来数与白银流通量窥探一二,表5为1570—1649年抵达菲律宾的年均中国船数和流入中国的白银数量。依据全汉升的观点,中国输往菲律宾的货物中,绝大多数为丝绸,“在1588年和之前,中国输入马尼拉的货物,以价值论,约有9成以上为丝绸”。“1605年期间,中国商品平均每年输往菲律宾的商品金额为115万两,丝货因之为103万两。”^[29]苏州丝绸在菲律宾售价虽高,但也千金难求,“中国湖丝百斤,值银百两者,至彼得价二倍”^{[24]91}。

表5 1570—1649年抵达菲律宾马尼拉的年均
中国船数和流入中国的白银数量

年份	船只数(年平均)/艘	流入中国的白银/万两
1570—1579	7.5	28.5
1580—1589	23.4	88.9
1590—1599	18.5	70.3
1600—1609	27.4	104.1
1610—1619	27.3	103.7
1620—1629	23.7	90.1
1630—1639	36.8	139.8
1640—1649	18.1	68.8

注:本表来源于文献:吴承明.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271—272.

表6为明代输入南洋诸国丝绸产品统计表,南洋诸国都与中国发生了直接或间接的丝绸贸易。明代中后期,还出现了以菲律宾马尼拉为中转地的中国和拉美地区之间的丝绸贸易。明朝政府于隆庆元年部分开放海禁,准许民众商人到东洋、西洋开展贸易,东洋为吕宋、苏禄等国,西洋为交趾、占城、暹罗等国。^{[15]339}从此起,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海上贸易进入了一个新阶段。^{[15]340}虽然菲律宾在这个贸易格局中处于中转站地位,但是,大量丝绸也进入到了菲律宾为中心的南洋地区。在丝绸贸易方面,尤其以中国-菲律宾-拉美地区的“太平洋丝绸之路”引人注目,苏州丝绸产品通过闻名世界的菲律宾马尼拉大帆船中转输往拉美各地,输往拉美地区的丝绸产品价值之高,“1601年,在海上失事的商船圣托马斯号,所载丝货价值竟超过法定限额200万比索”^[30]。中国丝绸产品输往拉美地区是通过菲律宾马尼拉中转来实现的,在马尼拉贸易繁盛时期,每年开往菲律宾的中国商船常在二十到六十艘之间。

表6 明代输入南洋诸国丝绸产品统计表

明代时期国名	今属国家	丝绸产品种类
占城	越南	绫丝、绫绢
真腊	柬埔寨	锦、缎、丝布
暹罗	泰国	色绢、色缎
交栏山	印度尼西亚	五色布绢
旧港	印度尼西亚	五色布绢、色缎
重迦罗	印度尼西亚	花绢
满刺加	马来西亚	色绢
麻逸冻	菲律宾	五色布绢
彭坑	马来西亚	色绢
阿鲁国	印度尼西亚	色缎、色绢
苏门答刺	印度尼西亚	色绢
花面国	印度尼西亚	缎、帛

注:本表来源于文献:朱鹏.试论明代前期中国与东南亚的丝绸贸易[J].怀化学院学报,2002,21(4):32-34.

(三) 欧美辐射圈

丝绸辐射圈产生的主要影响主要体现在商业和文化两个方面,其辐射的模式常常是以商业为目的,但是在商业贸易中,贸易国或地区的文化也被潜移默化影响了。

1. 对欧洲的影响

a)商贸上,在欧美辐射圈里受到冲击最大的当属的西班牙,再给予其商业性沉重打击的同时,也为其殖民统治的瓦解打下了经济基础。西班牙丝织品本来在国际市场也占有一席之地,可是随着价廉物美的中国丝织品的冲击,西班牙丝织品一时无人问津,西班牙殖民政府一度颁行禁止其控制的地区与中国进行丝绸贸易的政策,但是利益的刺激令其政策如同虚设。后来为了平衡贸易,西班牙只能向中国输出白银,据记载1565—1820年间,西班牙从墨西哥攫取了大约白银四亿比索,通大部分通过马尼拉输入了中国。但是这种平衡举措治标不治本,当丝绸被输送到西班牙的殖民地拉美地区时,中国丝绸凭借其价廉物美之优势,与西班牙丝绸展开丝绸商业大战,最终以中国丝绸产品获胜,西班牙在拉美的主导性产业——丝织业趋于瓦解,有学者认为这场中国丝绸获胜的商业大战“加速了西班牙经济的衰落,促进了拉美民族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发展,为19世纪的拉美独立战争奠定了物质基础”^{[31]105}。

b)文化上,苏州丝绸对于欧洲地区的另一个巨大辐射影响体现在对欧洲社会转型方面。16世纪欧洲发生了著名的“商业革命”和“价格革命”,就两起革命而言,其与西班牙、葡萄牙两国联系十分密切,有学者认为两起革命发生的原因在于来自美洲的大量金银涌入欧洲,引起货币贬值物价上涨。也有学者认为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过渡引起的社会结构变化,西欧由农本转向重商才是两起革命的真正动因。^[32]笔者以为西欧商品经济在16世纪的跨越式发展,离不开新航路开辟后急速扩大的海外贸易,而西、葡两国当时海外贸易的重点区域在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和新拓展的殖民地——拉美,而与这些地区的贸易又以丝绸贸易为主。可以说16世纪的西班牙、葡萄牙两国在丝绸为主的海外贸易中,商品经济获得巨大发展,进而将社会经济变革蔓延到西欧其它地区,两起革命由此产生,进而推动了欧洲的社会和时代的转型变革。

2. 对拉美的影响

在新航路开辟后,西、葡殖民势力染指拉美地区,随着西、葡东进,逐渐渗透进东南亚地区,西班牙

所占据的菲律宾群岛成为东西方商业贸易的中转站,将欧洲、美洲、亚洲通过商业贸易联结在一起,世界市场的轮廓逐渐完善。随着商业贸易的往来,中国的丝绸产品也不断运抵拉美地区,在国际贸易中形成了著名的“太平洋海上丝绸之路”,以至于当时“沿南美洲海岸,无处不有中国丝织品的踪迹”^{[19]65},可见中国丝绸在拉美占据了广大的市场。绚丽多彩的中国丝绸更是被拉美人民称之为“春天”,可见人们对其喜爱之情。

a)商贸上,丝绸对拉美地区的商业辐射影响也十分深刻,中国丝绸的盛行刺激了拉美丝织工业的发展。中国输送到拉美地区的丝绸产品,碍于空间与时间的限制,并不能满足需求量极大的拉美市场,在此情况下,拉美民族丝绸工业应运而生,他们通过太平洋丝绸之路从中国购买大量生丝原料仿照中国丝绸进行生产,以至于“当时墨西哥用中国生丝织成的锦缎可与欧洲制作的任何产品媲美”^{[19]71}。拉美丝绸工业的大发展为拉美资本主义萌芽奠定了基础,最早从事丝绸工业的一批人也逐渐成为最早的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群体,这为后来19世纪的拉美独立运动奠定了经济基础。

b)文化上,中国丝绸对于拉美地区的辐射影响,更多地体现在文化上,丝绸的输入极大地变革了拉美人民的服饰文化,拉美地区由于开发较晚生产力水平发展较低,又加之西葡殖民势力的残酷压榨盘剥,许多拉美人民苦于无衣可穿,当价廉物美的中国丝绸传入之后。有人称道:“不论男人和女人,都穿得十分讲究,丝绸的衣料比呢料和布料用得更多,甚至连下层居民也穿丝绸。”^{[31]104}

随着殖民侵略活动,西班牙、葡萄牙将天主教宗教信仰也移植到了拉美地区,天主教势力至今在拉美地区仍然很强,天主教作为基督教的一个保守流派,其十分推崇与遵循宗教礼仪与祈祷习俗,其十分注重教堂陈设与宗教威严,是故宗教教堂经常布置得十分华丽,在布置教堂方面,物美价廉的中国丝绸起到了无与伦比的作用,当中国丝绸与宗教信仰相结合,被置于与上帝共同受到敬仰的位置时,拉美人民已经将中国丝绸视作神物,在拉美人民的心理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四、结 语

苏州丝绸以产品为载体通过海外贸易逐渐在全球形成东亚、南洋、欧美三个辐射圈,通过辐射圈对贸易国或地区产生了积极的或经济或文化方面的影

响,为世界多元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和社会时代的进步与转型做出了突出贡献。

从历史与现实相结合来看,研究明清时期苏州丝绸的海外贸易,从苏州一地之视角切入,在了解苏州“海上丝绸之路”悠久历史的同时,更能挖掘出“海上丝路”形成的共同价值基础,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创造出圆融、共赢、合作的机会和条件,为中国当前进一步深化的经济建设与改革拓展全新的空间,也为中国的发展创造一个和平安定的周边环境。同时,中国的“丝绸之路”的愿景将有助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梦”。

参考文献:

- [1] 魏徵. 隋书[M]. 北京:中华书局,2000:603.
- [2] 范金民.“苏样”、“苏意”:明清苏州领潮流[J].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3,50(4):123-141.
- [3] 余同元. 苏州文艺评论:2013辑[M].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14:25-40.
- [4] 张翰. 松窗梦语[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 [5] 吴邑志[M]. 济南:齐鲁书社,1996:376.
- [6] 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苏州市志:第二册[G].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144.
- [7] 宋应星. 天工开物:下卷[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314.
- [8] 严均可. 全晋文[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775.
- [9] 沈约. 宋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4:1533.
- [10] 张廷玉等. 明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4:1900.
- [11] 石琪. 吴文化与苏州[M]. 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92:55.
- [12] 崔瑞德. 剑桥中国明代史(1368—1644):下卷[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 [13] 司马迁. 史记[M]. 点校本. 北京:中华书局,1959:1407.
- [14] 苏州历史博物馆等编. 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G].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331.
- [15] 范金民. 衣被天下:明清江南丝绸史研究[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
- [16] 余同元. 明清江南战略地位与地缘结构的变化:兼论文化江南的空间范围[J]. 江南大学学报,2013,12(4):56-60.
- [17] 林仁川. 明末清初私人海外贸易[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267-272.
- [18] 利玛窦. 利玛窦中国札记[M]. 何高济,等,译,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238.
- [19] 张铠. 明清时代中国丝绸在拉丁美洲的传播[J]. 世界历史,1981(6):63-72.

- [20] 邵莹. 湖丝外贸与江南市镇的近代变迁: 以南浔镇为中心的考察[J]. 浙江学刊, 2012(1): 37-42.
- [21] 晁中辰. 明代海外贸易研究[M]. 北京: 故宫出版社, 2012.
- [22] DENIS TWITCHETT.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The Ming Dynasty, 1368-1644: Part 2 [M]. Camb: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348.
- [23] 范金民. 明清时期中国对日丝绸贸易[J].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1992(1): 28-37.
- [24] 吴恩培. 吴文化概论[M]. 南京: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6: 91.
- [25] 松浦章. 明清时代东亚海域的文化交流[M]. 郑洁西, 译, 南京: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9: 135.
- [26] 苏州市档案局. 苏州丝绸档案汇编[G].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5: 921.
- [27] 高艳林. 明代中朝贸易及贸易中的相互了解[J]. 求是学刊, 2005, 32(4): 115-121.
- [28] 王翔. 中国丝绸史研究[M]. 北京: 团结出版社, 1990: 220.
- [29] 李隆生. 明后期的海外贸易探讨[D]. 上海: 复旦大学, 2004: 139.
- [30] 严中平. 丝绸流向菲律宾, 白银流向中国[J]. 近代史研究, 1981(1): 144-155.
- [31] 张世均. 论 17 世纪中国丝绸对拉美的影响[J]. 求索, 1992(1): 101-106.
- [32] 蔡正平. 论“价格革命”的真正动因[J]. 重庆商学院学报, 1998(4): 85-86.

International Radiation Circle of Suzhou Silk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from Macro-Perspective

JING Miaochun

(School of Society,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215123,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macro background of building silk road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Suzhou silk during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s of more great practical and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Through document analysis method and data integration, this paper reveals the development of Suzhou silk and foreign trade from the development perspective of Suzhou silk during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Suzhou silk occupied an important position during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nd a radiation circle with commerce and culture has derived in the global market.

Key words: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Suzhou silk; overseas trade; international market; radiation circle

(责任编辑: 王艳娟)